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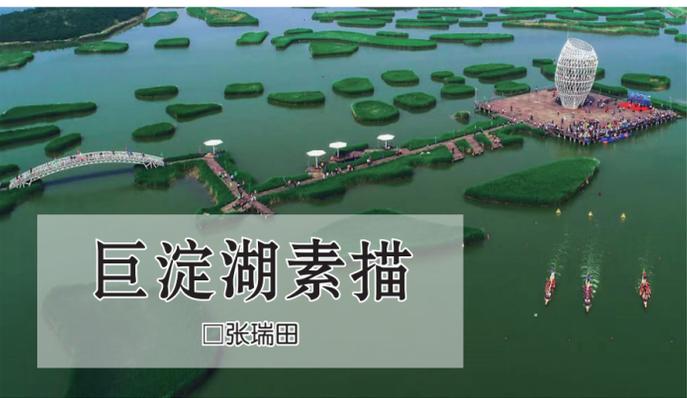


真正的文化大家,都有一个高洁而执着

的灵魂。

幸甚,上世纪90年代初,我陪在一家文化刊物当记者的妻子雪扬,登门拜访了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常书鸿先生及夫人李承仙,迄今忆及,常老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。那是199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,杂花生树,乱草飞鹭,明丽的阳光把树影投在街面上,浪花般溅起一串串欢快的鸟鸣。我们如约来到常老的寓所,进入画室兼书房。哇!那仿佛是敦煌的一块“飞地”:墙上挂的油画是翩翩起舞的飞天,大照片是先生在敦煌的留影,一幅书法作品是《咏敦煌》的诗词,书架和博古架上摆满了有关敦煌的书和纪念品……房间虽然宽敞,却被遥远的敦煌塞得满满的,仿佛先生把敦煌石窟的一角搬进了家,从此便是终生的守护和依偎。

那年先生88岁,言谈不很畅达了,但记忆和思路仍很清晰,笑声也很响亮。常书鸿生于1904年的杭州,从小多才多艺,青年时代长得白面长身,美丰仪,一看便知是出身富贵之家的翩翩公子哥。1927年,年方弱冠的常书鸿赴法国学习美术,其间见到许多被盗运和倒卖到欧洲的敦煌经卷、壁画和其他流散于巴黎的文物,赫然摆放在很多博物馆或贵妇的沙龙里对外展出。常书鸿深感痛心,几乎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。回国后他亲往敦煌考察,发现那里黄沙漫漫,几成不毛之地,许多石窟被流沙掩埋,文物损毁和被盗窃的不计其数。常书鸿天生是艺术之子,对祖国的历史文化,哪怕是一块秦砖汉瓦都爱得如痴如醉。那时,政府和诸多好友皆为它安排了养尊处优的好职位,但目睹敦煌之惨状,常书鸿痛心不已,经与好友梁思成、徐悲鸿商量,他毅然决定弃绝一切功名利禄,住进敦煌石窟附近的一座荒寺,并把妻子孩子接来,从此一生不离不弃,做了敦煌的“守护神”。1942年,于右任到西北



上善若水,对水,我有别样的感情。朋友安排了巨淀湖之旅,我暗自高兴,平生又多了一次与水亲近的机会。

巨淀湖位于山东寿光市西北部,由织女河、阳河、益寿河、张僧新河汇集而成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的领导详细介绍了巨淀湖的来历,我也记住了汇集巨淀湖的那几条小河。我对这几条小河有特别的感觉,如不是时间有限,我会去织女河寻找浪漫的爱情,去阳河感受英雄的气概,去益寿河抚摸漫漫的时光。我把这样的想法埋藏在心里,想着明年草长莺飞,我会再来,穿过幽谧的芦苇荡,在鸥鸟翅膀拍打的声音里,逆流去探望那几条小河。

第一次造访巨淀湖,已是初冬季节。汽车驶入湖区,远远看见枯黄的芦苇丛,一丛丛的芦苇,在水中顽强站立。依然有飞鸟飞过芦苇丛,展翅飞翔的鸥鸟,划过的曲线异常优美。我看着那条曲线,想起草书弯曲的线条,感受到古人所说“外师造化,中得新源”的妙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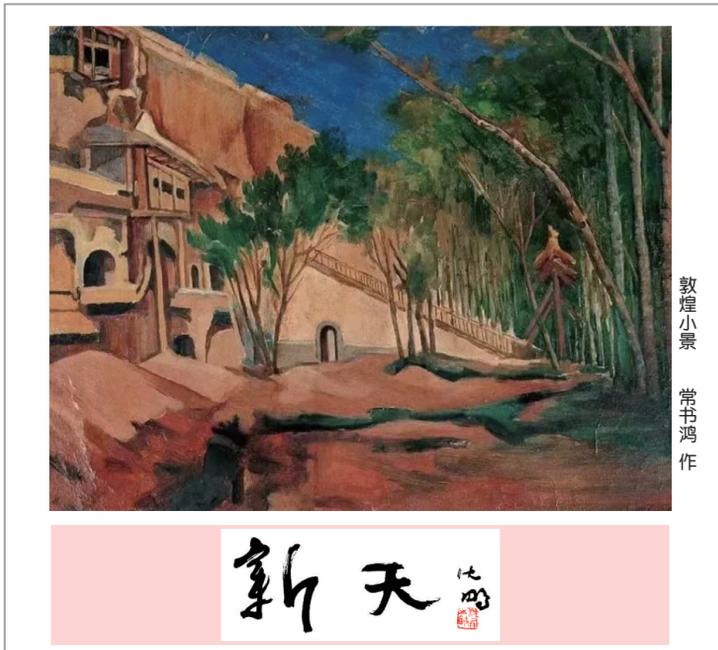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乘观光车进入巨淀湖的深处。一组巨大的雕塑引起我的注意,这是汉武帝躬耕雕像。我走过去,看见高大的汉武帝刘彻左手抱着麦穗,目光如炬,走向前方。他的身后,是扶犁播种的农民,他们辛苦劳作,任劳任怨。这组雕塑是有历史依据的,《汉书》记载,征和四年(公元前89年),汉武帝曾耕于巨淀。在一首民谣中,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汉武帝在巨淀湖畔耕种的情景:桃花盛开三月天,武帝躬耕于岭南,微风习习尚觉寒,湖中荡来打鱼船。

征和四年,汉武帝的确来过山东。正月,他在东莱(今山东掖县)想出海求仙。群臣上谏劝阻,刘彻不听,意欲入海。这时,暴风骤起,海浪滔天,刘彻只好返回。两个月后他到泰山封禅,见到群臣,要求追究让他入海求仙的方士。这时,他讲了一番有深度的话:朕即位以来,所为狂悖,使天下愁苦,不可追悔。从今开始,凡是伤害百姓,浪费天下之事,全部废止。先前我糊涂,被方士所欺骗。天下哪有什么仙人?全是妖言妄说。注意节食,有病服药,身体就能健康。

刘彻应该是从掖县来到寿光巨淀湖的。他在这里耕作,表达对

视察,听说常书鸿长年枯守莫高窟,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,于是特批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,由常书鸿出任所长,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常书鸿发些薪水,以解决一家人无米之炊的难处。那会儿正是烽火连天、兵荒马乱的年代,为防盗贼、兵痞和土匪的抢掠,常书鸿不得不备了一支手枪,夜夜放在枕下。

先生的首任妻子陈芝秀是出身杭州豪门的千金小姐,天生丽质,美艳照人,亲友们无不称赞她和风度翩翩的常书鸿是“天生的绝配”。但是,常先生留守敦煌之后,陈芝秀受不了那种远离红尘、孤悬大漠的



大地尊崇,对农业的重视。同时也说明,巨淀湖在历史的长河里风光一时,远近皆知。

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的同志们工作细心,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寿光的文字资料,我们由此得知巨淀湖的今昔。明清,巨淀湖更名清水泊,后来又恢复巨淀湖的原名。1923年,巨淀湖重要的水源淄河改道,蓄水量锐减。同时,湖北岸出现塌河,湖水北泄,蓄水量再度下降。湖底泥沙淤积,湖区高于地面,又导致湖水流失。即便如此,至上世纪30年代,巨淀湖的水域面积仍有五万多亩,南北长10余公里,东西宽7.5公里,是寿光生态的调节器,是寿光农业的保护神,更是旅游观光者迷人的乐园。

每到一处水域,我都要把水捧在手中,感受水的清澈和通透,看着水从我的手指间回落到湖中。如果天气好,我还会跃入水中畅游,那一次次地跃入,是我向水的真挚倾述。

站在巨淀湖边,四处眺望,依然觉得巨淀湖的雍容博大。《史记》称“东海引巨淀,穿渠为溉田”,说明了这座大湖对寿光农业所立下的历史功勋。时下寿光市发展现代农业,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,巨淀湖自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,站在湖边,我发现,巨淀湖不仅仅属于农业了,对寿光人来讲,它更是优质生活的保证,是小康社会的证明,是追求中国梦的动力。无边无际的湿地,丰盈的水草,种类繁多的鸟群,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资源,无疑是一座真正的世外桃源。我在湖边徜徉,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摄影发烧友,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,正用镜头捕捉鸥鸟飞翔的姿态,或者聚焦一丛随风摇曳的芦花、水下的鱼影、远处的夕阳……初冬,游客络绎不绝,只是偌大的湖区,我们的身影显得单薄,我们的笑声很快被稀释,我们像走进一个巨大的历史时空中,除了巨淀湖,其他都很渺小。

夕阳下的巨淀湖别有一番风韵。远处,摩天轮在慢慢旋转,与之配套的现代化游乐项目,按部就班地运行。另一侧是占地80多亩的动物园,虽然听不到狮吼虎啸,但缕缕腥风掠过,依然有心惊肉跳的感觉。古老、深厚、空旷、野逸,自然、奔放,是巨淀湖的核心美学吗?当然,这些文化要素和景观特点说明了一切。寿光人没有止步,在此基础上,他们不断开掘。那个创意感十足的海洋水世界,又把悬念、人性、亲情集于一体,给观光者带来了新的体验。多功能水上主题公园、系列时尚水运动,对我构成了深深的诱惑;惊心动魄的海啸池,是探险爱好者的兴奋景点;而合家欢乐亲子乐园,又勾勒出浓浓的人间情意。至此,巨淀湖从历史的时空中走来,又向新的历史时空中走去。

离开巨淀湖之前,我折下一根芦苇。常言道,芦苇是湖水的孩子,湖水是芦苇的记忆。我把这根芦苇带在身边,想念巨淀湖的时候,嗅一嗅芦苇的气味就会释然。我还想请画家画下这根芦苇,画成油画,把芦苇根叶的肌理画得粗犷、神秘,可以画得不那么具象,但必须有力量,让它成为千年巨淀湖的证明。

凄苦生活,几乎天天以泪洗面,靠翻看父母和杭州的老照片打发时光。不久,一位退役的国民党军官赵忠清到敦煌求职,自称愿意做常书鸿的学生。没想到时间长了,此人与陈芝秀暗生情愫,一年后,陈芝秀抛下13岁的女儿常沙娜和3岁的儿子,与赵忠清私奔他乡,但后来的下场很是凄惨。常沙娜生于法国,6岁随父母回国,中学毕业后赴欧美留学,主攻欧洲艺术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听从父亲召唤,只身漂洋过海,从美国回到祖国。父女二人,一个被称为“敦煌守护神”,一个被称为“敦煌的女儿”,一家人数十年甘于清贫,远离都市,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。后来惊艳中外的“飞天”壁画,就是父女在吸纳敦煌壁画的基础上精心创作出来的民族瑰宝。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,北京搞了名闻全国的十大建筑,常家父女一起参与了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等重要建筑的设计工作,一瓣心香,永留史册。

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热烈。只要说到敦煌,常老便谈笑风生,眉飞色舞,很多久远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。说起首任夫人的离去,老人家也有些自责道:“那时我光顾着守护敦煌了,完全没考虑人家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需求,这是我的不对。”

老人家讲话乡音很重,不时需要夫人李承仙在旁翻译。告别时,常老意兴犹浓,主动说:“我给你们写幅字,留个纪念吧。”夫人研墨铺纸后,常老从容走笔,写下7个力透纸背的大字,“来世仍做常书鸿”。

这就是先生一生的风骨与傲骨啊!1994年,常书鸿仙逝,享年90岁。按先生遗愿,骨灰葬于敦煌,仍是不离不弃的永远相伴和留守。



宋神宗元丰三年(1080年)二月一日,从整整一百三十天牢狱之灾中脱身的苏轼携长子苏迈到达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正值春寒料峭,万物复苏,一路踏雪碾霜的苏轼也终于有了内心的寒冰解冻之感。

他经历的牢狱之灾是轰动一时的“乌台诗案”。事发于元丰二年(1079年)四月,苏轼赴湖州任太守当日,例行公事地上书《湖州谢上表》。不料,表中“陛下知其愚不肖时,难以追随之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”等句被人攻击为“无尊君之义,亏大忠之节”。龙颜大怒的神宗命太常博士皇甫遵赴湖州拘捕苏轼。八月十八日,苏轼“如驱犬鸡”般被押入开封御史台监狱。

幸好,朝中为苏轼求情的重臣不少,连太皇太后也出面干预,犹豫不决的神宗最后因辞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“岂有盛世而才士者乎”的一言之谏,将苏轼贬至黄州结案。

到黄州后,苏轼住进一个叫定惠院的寺庙。面对自己的死里逃生和眼前的长江如带,苏轼写下了一首《初到黄州》的七律:

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
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
逐客不妨员外置,诗人例作水曹郎。
只惭无补丝毫事,尚费官家压酒囊。

自古诗为心声,这首七律确能体现苏轼性格。刚刚惊魂初定,就不忘总结自己“平生为口忙”的祸从口出。但总结归总结,诗中并未见他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打算,譬如宣称以后会世故一点、圆滑一点。相反,刚一踏足荒僻的流放之地,他就难以置信地将心理重心调节为“知鱼美”和“觉笋香”。从中看出,经历生死后的苏轼,像是瞬间看透当时官场蕴含的荒谬,也就有意无意地将目光和内心转向不被侵犯的领域。

出狱时,苏轼的二十余口家小都先安置在苏辙家寄住。到五月得苏辙将其家眷送至距黄州二十里外巴河口的消息后,苏轼立即乘船相迎。虽在出狱时答应弟弟,自己以后将“畏蛇不下榻,睡足吾无求”,但苏轼毕竟是易生感慨的诗人,眼见舟行浪破,大河滔滔,一首《晓至巴河口迎子由》的诗篇一挥而就。尽管诗中仍有“去年御史府,举动触四壁”的痛苦记忆,但现在痛苦要结束了,苏辙来了,妻儿来了,侍妾朝云也来了,终于在黄州重建自己的生活了。他不需要很多,能“早晚青山映黄发”就已满足。

二十多口家眷不可能和他同住定惠院庙中。幸好,在武昌任鄂州太守的朱寿昌出面,将苏轼一家“迁居江上临皋亭”。十余年前,为寻找苏轼足迹,我特意到黄冈访古。在文峰宝邸后门处,有块巨大的浅褐色石头,上面写着“临皋亭遗址”五字。千年前的模样无以还原,但苏轼笔下的“江山风月”依然如故。在长江边散步驻足时,我想象苏轼“时时策杖至江上,望云涛渺然”的样子。当他不再萦怀朝政,只以风月主人自居时,心中放下的恐怕是他曾孜孜以求的事物。人生究竟何种为重,何种为轻?何为短暂,何为永恒?苏轼以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得出了答案,从他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“足下所见,皆故我,非今我也”的句子看,在黄州的苏轼确已脱胎换骨,进入了一种超越从前的思想之境。

任何境界来临,既因人,也因物。苏轼到黄州才十余日,就有一个叫王齐万的蜀人渡江来访。王齐万与其兄王齐愈原为四川有名的藏书家,早闻苏轼大名。王齐万与苏轼见面后言谈投机,当王齐万告辞时,苏轼冒雨将他送至江边,然后登上“高丘以望之,仿佛见舟及武昌,乃还”。此后只要苏轼过江,必入王家把盏为欢,时间若晚,便索性宿于王家。这是苏轼到黄州后交到的第一批肝胆相照的朋友,他的第二批朋友是因酒结缘的兄弟三人。苏轼酒量虽不大,仍“殆不可一日无此君”。在樊口(今鄂州市西部)开酒店的潘丙就与苏轼因一买一卖而相熟。潘丙又将哥哥潘夔和弟弟潘原介绍给苏轼认识,此外,潘丙还为苏轼介绍了两个市井朋友,一个叫古耕道,一个叫郭遵,深入市井后,苏轼“自喜渐不为人识”。平凡是真,苏轼热爱的原本是生活本身,也就没必要如以前那样,任登门者络绎不绝,使自己不知不觉成为众星捧月的核心。

有几个朋友就够的苏轼终于感到内心安定。比朋友更有疗愈作用的是,进定惠院后的苏轼很自然地曾目光转向佛经,使郁积的苦闷得以消解。此外,幼年曾习过的道学也进入苏轼的生活。当苏轼贬谪州后不久,来信告知一个女儿夭折,与此同时,苏轼的老乳母任采莲也因年高去世,刚进十月,又传来堂兄苏不敏于成都病逝的噩耗。痛感生命无常、命运更无常的苏轼在天庆观借了三间道堂,冬至后入室,静坐了七七四十九天。苏轼终于明白,自己能做的就是“独善其身”了。看淡了荣辱,也看淡了生死,不觉日日“扁舟草屨,放浪山水间”。老子所谓的“道法自然”,就是谁也不需模仿谁的生活自然。官场的种种规矩和姿态在市井和山水间荡然无存,苏轼解开束缚的证明,从他写给朱寿昌的一阙《满江红》中可见,“狂处士,真堪惜。空洲对鹦鹉,苇花萧瑟。不独笑书生争底事,曹公黄祖俱飘忽。愿使君,还赋谪仙诗,追黄鹤”。这种超脱,也水到渠成地带给他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大彻大悟。

除了黄州结识的新友,还有一些旧友如马梦得也千里迢迢地前来看望苏轼。到黄州后,马梦得见苏轼的临皋亭住所便狭,遂以欲辟农场为由,向当地申请一

块废地,转赠苏轼。

该废地在东城门外,无人光顾,遍地颓垣草棘,碎石瓦砾。苏轼看过后,兴致勃勃地为其规划蓝图,亲扫瓦砾,自种黄桑。终于,元丰五年(1082年)二月的一个大雪纷飞之日,也是苏轼到黄州整整两年后,为自己落成了期以“寄余龄”的住所。因地在城东,苏轼索性将其命名为东坡,自己也取了个“东坡居士”的号。

有了住所,苏轼也就恢复了奋笔疾书的生涯,完成了父亲苏洵临终前命他续写的《易传》。苏轼从自己的人生起落和大自然的万物轮回中得出了稿中“万物皆有常形,惟水不然……今夫水,虽无常形,而因物以为形者……是以造物而无伤”的思想结晶。这是苏轼的性格超然所致,是他经历了生离死别后的人生体会所致,也是他在儒释道三者交融后的领会所致。当他在该年连续数次前往赤壁后,更成熟蒂落地完成了足以俯仰古今的惊世之作。

第一篇就是无人不熟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无数注家众口一词,认为该词为苏轼的豪放之作,但从他“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”的句中又能体会到,他自认追慕前人不过是自己的一番“多情”所蕴含的苦涩失落。周瑜的功成名就与自己的流放生涯对比太过强烈,对“人生如梦”的感慨也就显得自然而然,尤其面对自己的“早生华发”,更不可能不感叹“吾生有涯”的生命短暂。世人所谓的岁月如流,不过是文人的惯常比喻,真实的水在苏轼那里能“造物而无伤”,就因为水是大自然的永恒之物。所以,他在随后写下的《赤壁赋》里就收敛感叹,直面了大自然的不朽真知。

赋的落笔不同于《念奴娇》的思追千古,而是直接交代自己与“客”一边饮酒,一边“诵明月之诗,歌窈窕之章”,继而极尽生花之笔,描写亲见的无伦美景,“少焉,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以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。当苏轼在《念奴娇》中追慕周瑜的“雄姿英发”时,读者也不可能不在这篇赋中追慕苏轼因景所生的“羽化而登仙”之感。

翻遍《古文观止》,再没有哪篇中的哪句比得上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,抱明月而长终”更令人震撼的人生体悟了。我一直觉得,赋中之“客”,或许不是有人以为的杨世昌或张怀民,而就是苏轼自己。他在《念奴娇》中感叹过的“人生如梦”,不就是赋中的“哀吾生之须臾”?他“时闻长啸”的结果,也必然会导向“羡长江之无穷”的思想涌动,至于“抱明月而长终”,也只有像苏轼这样历经沧桑而走向超脱的人才能拥有的襟怀。杨世昌与张怀民是苏轼的黄州友人不假,但他们未必具有与苏轼展开如此深度对话的才力;另外更常见的,越是“高处不胜寒”的人物,越会与自己展开溢满思想浆汁的对话。

人生终究短暂,只有清风明月永恒,这是苏轼走到人生深处时的幡然领悟。佛家有“放下”一说,孔子也有“有德者必有言”一说,所谓“言”,就是穷尽人生后的真相言说。苏轼告诉世人,人总想达到风光霁月的境地,但到不了的始终是多数。到不了,是因为放不下;放不下,是还不懂得“造物者”的“无尽藏”究竟指向什么。

写下该赋三个月后,苏轼再一次夜游赤壁。这次有“二客从予”,苏轼仍没说“二客”是谁,全文核心是他兴致勃勃地独自“摄衣而上,履巉岩,披蒙茸,踞虎豹,登虬龙,攀栖鹤之危巢,俯冯夷之幽宫,因客方未能跟上,苏轼“划然长啸”,使眼前“草木震动,山鸣谷应,风起水涌”,更使自己“悄然而悲,肃然而恐,竟至‘凜乎其不可留也’”。

从文字中能够体会,苏轼的两篇《赤壁赋》一脉相承。当苏轼以“适有孤鹤,横江东来。翅如车轮,玄裳缟衣,戛然长鸣,掠予舟而西也”的神来之笔表达了对人以外的生命注视和敬畏时,就令人发现,一千年前的苏轼已具有非比寻常的现代思维。在黄州化蛹成蝶的苏轼,突破的不是简单的官场失意,而是对自己的弟弟进行了一次再也未松开过的紧箍。

每次重读苏轼这些作品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当年站在赤壁矶前的时刻。赤壁矶没有我想象的磅礴,甚至和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石崖没什么大区别。我只记得我当时不停地对自己说,这就是苏轼当年站过的地方,这就是苏轼面对过的赤壁。它是不是周瑜破曹的真正之地根本不重要,重要的是,苏轼在这里告诉了世人永恒的真相真理,使人最终懂得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生活谜底。

理解了变与不变,理解了永恒,苏轼的流放生涯就不再像屈原那样“忧心愁悴”,他的旷达,与其说来自性格,不如说来自领悟,所以他会人在后来更远的流放中写下“岭南万户皆春色,会有幽人客寓公”和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来豁然面对。能做到这点,都源自他在黄州四年多的人生体悟。当苏轼于宋徽宗建靖国元年(1101年)走到生命终点前,更不假思索地写下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黄州排在了首位。

从宋至今,喜爱苏轼的读者不计其数,但喜爱不一定是理解。在寻找苏轼的足迹时,我总觉得我理解了他,但转眼间又发现,苏轼不是为了某个后人的理解而存在的。甚至苏轼在乎的不是理解,而是眼前的自然山水和茫茫无尽的宇宙时空。认识时空,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人、认识物,继而真正地认识自己。从黄州开始,苏轼踏上的心内之路,鲜有人能重复。我在赤壁前留影时知道,我不是和一段历史合影,而是和一种难言的感慨和盼能追随的心愿合影。

除了黄州结识的新友,还有一些旧友如马梦得也千里迢迢地前来看望苏轼。到黄州后,马梦得见苏轼的临皋亭住所便狭,遂以欲辟农场为由,向当地申请一